



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/杨卓

真情

一把板栗

张洁

南方的冬天，又湿又冷，早上起来，头疼欲裂，前天晚上改稿到深夜一点，也难怪打不起精神来。

人到中年，忽然发现，一切没有变得像传说中的可以运筹帷幄，反而生出处处艰难之感。孩子还小，父母老了，而工作，容不得半点闪失，每一件事情，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去做，累到无以复加，却找不到出口，这就是中年人的日常。

再打不起精神，班还是要上的，日子总归是要过去。今天的工作，是去醴陵市均楚镇大垅洲村采访贫困户，山路崎岖，随着车的颠簸，胃开始翻腾倒海，下车的时候，我已经是脸色苍白，再加上山区的气温比城里更低，虽然穿着大棉袄，还是冷得发抖。

我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罗胜先的家里，罗胜先的母亲刘美玲今年85岁了，她看到有客人来，赶忙去沏茶。我手捧热茶，喝上一口，慢慢地安了胃和心，听刘姨开始絮叨。

刘姨59岁的儿子罗胜先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住在山区的土屋里，在家门口打点零工，收入微薄，更不幸的是，父亲和妻子一直身体不好，花费了不少医药费后，先后去世，让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。

“以前住在山顶的土屋，那路啊，又陡又滑，我去年就在家门口摔了一跤，手臂肿得衣服都脱不下，最后只好把棉袄剪烂了。”刘姨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看电视，是普通家庭最平常不过的事。以前在她家，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。家徒四壁，没有一样像样的电器，家里一年的电费也只有几十块钱。

去年10月，她家从摇摇欲坠的山顶土屋，搬到了易地搬迁后的明亮宽敞的新房，随对门口帮扶单位还筹集资金，送来一台42寸的创维大彩电。“我已经一把年纪了，真没有想到，这辈子还能住上新房，看上彩电，还有医疗救助等政策帮忙，好日子是越来越好了，这都是搭帮党的政策好啊！”刘姨用手揉了揉满是皱纹的脸，仿佛是要抚平岁月的沧桑。

“是自家的东西呢，不值钱，山路远，你带一点在路上吃。”告别时，刘姨硬是推着碎步追了出来，“逼”我带上一把板栗。板栗小小的，有风干的痕迹，一看就是收了很久的农产品。

我一再推辞，刘姨趁我不备，拉开我的挎包拉链，硬塞了一把进去。

这样的热情，让我想起早已逝去的外婆和奶奶，温暖、朴实得让人感动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剥开一粒板栗，慢慢地放在嘴里，确实甜。

是的，生活虽然有点苦，也总有一些瞬间，你会感受到人间之美，美到无法言喻。这，才是经历过深夜难熬的至暗，而我们依然要坚强的终极理由。你终究会品尝到生活的甜。



外公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毕业照

旧事

未曾谋面的外公

周湘涛

外公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，但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外公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被父亲送到湖南老家生活，1980年暑假，刚刚调回湖南工作的父亲，还带着在读小学的我到弟弟去西安接母亲，我才第一次在外婆家看到外公的相片，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英俊，像周总理，给年少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外公原名王润仓，后来改名叫王涯舟，1919年7月出生在陕西省澄城县。曾外公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乡绅，家境殷实。外公幼读私塾，稍长到当地蒲城著名的尧山中学读书。1937年，还在读高中的外公，受进步思想的影响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介绍了很多人去延安，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。因为外公积极为党工作，宣传抗日救国思想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，将他逮捕关进了监狱。外公承受了坐老虎凳、吊打等种种酷刑，但他没有吐露一个对敌人有用的信息，保护了单线联系的党组织。后来，敌人劝他，只要登报声明退出共产党，就可以获得自由。外公想，只有出去才能继续为党工作，就假意同意。但这个声明却给外公的一生带来了巨大影响。

出狱后不久，外公考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（前身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，七七事变后西迁兰州）学习，毕业后到西安中学教书。1948年外公去延安工作，在我党主办的军事政治大学教书（原抗日军政大学），1950年从延安调回西北大学，任学校的马列教研室主任，同时兼任西安市民盟的主委，曾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。

外公对党忠诚，性格耿直，嫉恶如仇。1956年，党中央提出“双百方针”，号召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。作为民盟的主委，外公对学校党委书记脱离群众的作风进行了批评，并对当时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，他衷心希望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越来越好。他说，党就像是月亮，民主党派就像是星星，肝胆相照，携手共进，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局面。外公的一个老师出于爱护，多次劝他不要去给组织提什么意见，保自己要紧。但外公心底无私，他想的还是为了党的肌体更健康，国家更好地发展，还是在很多场合表明自己的看法。

因此，“反右”的时候，外公便被错划为右派，受到残酷批斗，学校分配的四室一厅的房子被收回，换成两小间，月工资也由当时的150元降到110元。外公13岁那年就被家里安排娶了我的外婆，然后有了大姨妈和我妈妈，不幸的是，我妈妈刚断奶，外婆就因肺病去世了。外公后来又续娶了后来的外婆，并生养了5个孩子，这样外公一共便有了7个儿女。这点工资自然很难养活这样一个大家庭。我这个后来的外婆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在建国100周年时，陕西省有关部门还给她颁发了在党70年的荣誉证书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后来学校又把外公下放到偏远的岚皋县劳动改造，那里条件十分艰苦，缺水少食，外公受尽折磨，回到西安的时候，已经瘦成了皮包骨。外公有个弟弟在澄城县老家，叫王积仓，很多次骑单车走20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，风餐露宿两三天，给外公家送来点粮食，让这个家渡过难关。让妈妈和姨妈们至今想起就泪目的是，叔外公到西安一趟，满身泥土，劳累不堪，还不敢多住，经常悄悄又回去了。这个勤劳善良的叔外公后来活到快90岁，寿终正寝，现在他还有很多儿女在澄城县。

在岚皋县劳动改造两年后，外公又回到西北大学，可学校却不再让他教书，把他分配到历史系资料室工作。1966年，“文革”爆发了，外公又首当其冲，学校造反派把他揪出来，说他是叛徒，隔三差五开大会批斗，拳打脚踢，戴高帽游街，但外公始终保持做人的原则，没有揭发过任何一个人，也没有卑躬屈膝去求过人，看管他的红卫兵也不得不佩服。在运动中，外公的大量手稿、珍贵书籍被抄走而不知所踪，家里唯一值钱的一辆自行车也被造反派骑走。在反复的批斗中，外公也动过轻生的念头，但他想到自己的妻子和7个无辜的孩子，每次都在最后的时刻放弃了，继续默默忍受。

1976年，“文革”结束。1978年，西安市委公开为外公平反，随后外公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。遗憾的是，在历次运动中，外公的身心备受折磨，平反一年就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，此时的他还不到60岁。外公病逝后，西北大学为外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，姨妈们还记得，来的师生非常多，尽管有近二十年的时光未在教学一线，可学生们都还记得他。

外公虽是地主家庭出身，但一生追求进步，向往革命，历尽艰难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党的信仰。在家里，他是慈爱的父亲，对儿女爱护有加，虽然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但他无时无刻不教育孩子们要爱党、爱国，要认真读书，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。

如今，外公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，他的孩子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有大学教授，有工程师，有医务工作者，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，现在均已退休安享晚年。作为晚辈的我们，也要学习外公高尚的品格，坚定的信念，认真学习，努力工作来报效国家。愿外公在天之灵安息。



陈和平曾在朱亭镇浦湾村担任3年“村书记”，图为工作场景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对光吧

走进深口区朱亭镇浦湾村，“全国文明村”的招牌引人注目，而细说牌匾由来，村民们总会亲切地提到“陈书记”——66岁的退休干部、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市纪委监委原调研员陈和平。

6年前，陈和平到村里担任“第一书记”，当时的浦湾村还是软弱涣散村。走访调研后，他绘出村庄发展蓝图，不少人说他“口气大”，直摇头。

时光不负有心人，陈和平带着村民数年拼搏，在2020年如愿夺得荣誉牌匾，喜讯公布时，他已离开村里。

日前，陈和平做客“时光吧”，讲述他带领村民将软弱涣散村变成“全国文明村”的故事，分享驻村帮扶的酸甜苦辣。

一双棉鞋，一份承诺

我和浦湾村有着很深的缘分，说起来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情缘。提出创建“全国文明村”之前很多年，我就在这生活过，并留下了温暖美好的记忆。

1973年，我16岁，作为知青被下放到朱亭镇春石村锻炼。当时，我住在村民文大妈家，村民们对我们知青都很热情与关照。尤其是文大妈，那年冬天见我总爱穿解放鞋与雨鞋轮流穿，还生了冻疮，特地给我做了一双棉鞋，让我倍感温暖。

这份暖心的情谊，我牢记心间，也一直想找机会回报。2016年，这个机会出现了。

当年，市委组织部发出“招贤令”，号召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到省级贫困村或软弱涣散村任职3年。我那年60岁，是市纪委监委原调研员，正准备退休，第一时间报了名。

对我这个决定，爱人起初是反对的。我理解她的顾虑，当时我刚做完大手术，切除了一个肾，大小疾病十多种，每天都要吃药。她的身体也不好，一直在治疗。

由于合乡并村，春石村已并入浦湾村。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后，我成功报名并最终去到浦湾村担任“第一书记”。我想发挥自身余热，扎扎实实地为村里办点事来作为回报。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回”，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、对浦湾村的承诺。

那时的浦湾村刚合并不久，是软弱涣散村，村里办公房子狭窄破旧不到40平方米，账本上亏空数十万元。

我知道这块“硬骨头”难啃，但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，既然来了，还是要把事干成。经过深入走访调研3个月，听取村民意见，再咨询市规划设计院的专家后，我在心里逐渐绘制了一份村发展蓝图。

2017年，一次村会议上，我将“一村一环三区”的蓝图和盘托出：用3到5年，创建“美丽乡村”和“全国文明村”，打通一条村内环形公路，将合并前的3个村分别建成湘江休闲旅游区、立体林业区和鲜果小镇区。

话刚说完，就有参加会议的党员、村组长笑了。有人说，“陈书记是牛吃棉花，一口白”，说我口才还是好，不知道事情做得怎么样？

我笑而不语，对于质疑，行动从来都是最好的回应。

先立规矩，再兴文化

这个“村支书”确实不好当。浦湾村由原兴隆、春石、高升三村合并而来，合并后，党组织凝聚力不强、班子内耗严重，矛盾到纷频发。开个会就暴露了不少问题，我自己概括了一下：“9点开会10点到，10点半哈哈笑，到了11点，三言两语就完了。”

头一件事，我抓党建、抓班子，把规章制度立起来。我定下规矩：通知几点开会就必须几点到，迟到的罚50元钱作“学费”，以示警戒。可接下来的会议，仍有人迟到。

如何处理才能服众？那天晚上，我找到白天开会迟到的支委谈心，将纪律和制度的重要性都说明白。然后我提了个解决方案：明天开会，要么我交50块钱，说明我执行纪律不力；要么你交

50块钱，表明你迟到，甘愿受罚。这位支委被我的坦诚相待感动，当即表态：“书记，你说得对，明天你看我的。”

次日开会，这位支委主动站起来说：“上次开会我迟到，违反了纪律，今天我做检讨。希望大家都要遵章守纪，这样，我们浦湾村才有希望。”

规矩立起来，凝聚力自然不一样。我又带着村里的党员干部开展“微党课”、组建党员突击队等，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举措。

2017年4月，村级换届选举，我被推选为浦湾村党总支书记。如何创建“全国文明村”？在我看来，文化是根魂。

浦湾村本就是块“宝地”，湘江绕村而行，有商代古遗址，朱熹和张拭二人曾停留浦湾并结庐讲学，还有“万亩人工林海”瞭望塔等景点。村里旅游资源丰富，还紧临京港澳高速来亭出入口，京广铁路从中穿过，交通位置优越。英雄文化、传统文化、朱熹文化等，都是村里很有挖掘空间的文化亮点。

浦湾村有英雄，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牺牲的李铁桥等，便是其中的典型。通过墙绘、请老人讲述英雄故事等方式，我们大力在村里宣扬这种爱国精神。浦湾村曾是朱熹和张拭讲学之地，我们将村上的兴隆小学作为传承阵地，让孩子们从小学习朱熹的相关名言警句，提升文化素养。

同时，我们在村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开展移风易俗，评选敬老尊贤、孝敬父母等典型进行嘉奖；鼓励村民从自家庭院屋场做起，做好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，让浦湾村实现“内外兼修”的靓丽蝶变。

我的想法很简单，不仅要让村民在经济上富起来，还要在文化、思想及教育上也能一步一个台阶地提升，让“全国文明村”的梦想逐步照进现实。

圆梦，收获两块“国字号”招牌

2019年，我和村“两委”带领全村3000多村民，争取多方支持，浦湾村的面貌焕然一新：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建起来了，兴隆至高升片区的道路拓宽了，京广铁路春石段的涵洞贯通后村里的3个片区从此连接，而“鲜果小镇”等产业也初现雏形。

那年，我在一次村里会议上提出，举行一场大型文艺汇演，大家一听都纷纷响应。既然是全村的文艺演出，就需要一首村歌。感慨于这些年的变化，我写下了村歌《浦湾之歌》的初稿。

可我知道自己并不专业，为了把村歌打磨得更完善，我又邀请了国家一级编剧张林枝指教修改。在张林枝的牵线搭桥下，国家一级作曲家江晖又为词作谱了曲。

村里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村歌，这在当时的株洲还是首创。这首村歌在文艺汇演上一唱，村民们都激动又自豪。2020年9月，中国农村杂志社面向全国农村居民或村庄征集民间歌谣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将《浦湾之歌》送去参赛。

全国村歌大赛分五大赛区同时进行，原本，我想着能在分区赛取得名次就不错了，没想到一路从南部赛区赛进了总决赛，一举夺得二等奖和优秀组织奖。

2020年底，“全国文明村”名单公布，浦湾村也在其中。听到这个喜讯，我心里感慨万千，深感时光并未虚度，对浦湾村曾经对我的恩情也有了个交代。

“这里山也青，这里水也甜，百里林海披绿衫，千群齐努力，村民情相牵……”这首《浦湾之歌》，写的是浦湾，也书写了我在浦湾的那段难忘的奋斗岁月。



结缘半世纪，我以感恩谱写『浦湾之歌』

口述：陈和平 采访：李军